

念的質疑，認為即使不考慮宗族、社倉等與王朝權力密切關聯的社會組織，僅就國家的地方政府組織本身來看，清代縣以下也存在相當多實質的政治組織。其次，根據縣以下政治組織演進的邏輯，胡恆認為當下地方政府架構中，縣轄市是一個相當值得考慮的改革方向。

胡恆在書名中以一個問號為結尾，「皇權不下縣」這一論斷的確應當置以問號。對這一提問，直接給予肯定或否定回答似乎都不足以擊中其核心。正如胡恆在書中所揭示的大量佐貳官的活動，已經在鄉村社會中彰顯了國家的在場。但是，諸多佐貳官，不論與同時的縣級政區相比，或者與後來的區、鄉政區相比，還不能說是有完整行政權力的一級派出機構。而且清政府也從未打算將佐貳官發展成這樣的機構。這在胡恆的書中也是講的很清楚的。所以，對歷史學來說，所關心的不僅是皇權是否下縣了，更重要的是，皇權用什麼辦法來控制每一個縣的行政中心之外的廣大空間，尤其這個空間在明清時代並非靜止的，而是劇烈變化着的。

進一步說，從胡恆的研究中可以引申出更深刻的問題：區域如何形成。這已經直擊了歷史地理學乃至人文地理學的核心議題。從我們當下的生活經驗來說，那些描述與我們生活更為貼近的區域概念（街道、行政村、社區……）是如何在近三四百年的歷史中漸次生成並固化的，是相當值得我們不斷反思的問題。

趙思淵

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

潘光哲，《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（1833-1898）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4年，483頁。

晚清以降，我國學術受西方學術影響甚巨，但固有傳統仍保有生命力，如康有為、章太炎、王國維早年俱有趨新之論，但又相繼回歸本國學問的傳統，時至今日，中外學者的旨趣與取徑往往大有分別。中文學界對書籍、報刊、信劄等文獻不乏研究，但潘光哲認為既有研究大多以人物或學科為線索，往往停留在漫筆勾勒的層次上，對歷史語境的複雜之處把握不足，因此要借他山之石來攻玉。羅伯特·達恩頓(Robert Darnton)是「閱讀史」領域的代表人物，其核心方法是追蹤書籍的編纂、出版和流通過程，重建讀者在歷

史中的閱讀場景，以此勾勒出知識傳播的脈絡。其核心問題在於動態地把握「讀者—文本—意義」，「把閱讀行為放在具體的歷史時空與脈絡裡」加以考察。（頁5-6）中文學界在此領域的嘗試大致始於本世紀初，潘光哲得風氣之先，而本書正是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（潘光哲，〈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——「知識倉庫」、「思想資源」與「概念變遷」〉，《新史學》，第16卷，第3期，頁137-170）。歐美閱讀史的既有成果以個案研究為主，尚未實現與歷史的總體敘事對接。潘氏借鑒「閱讀史」的研究方法，並非「邯鄲學步」，而是要激發新的研究思路，希望在現有知識的基礎上實現局部突破，關照歷史的整體。

歐美閱讀史的開展有其資料優勢，歐美各國很早就建立起整套書籍出版、審查、監管制度，作家、書商、讀者的通信大量留存，而這些條件是研究晚清閱讀史所不具備的，研究者必須因地制宜。本書在材料上用力甚深，但並不依賴「名山秘藏式的史料」，而是以深耕常見材料為主。潘光哲以繼承「樸學」遺風自期，欲以堅實的考證功夫超越既有的歷史敘事。用文本比勘的辦法研究《重訂法國志略》，發現王韜對法國國會的描述乃是「移花接木」，便是一例。

此書的時限為1833年至1898年，時間跨度較大，自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創刊始，是為知識領域發生變化的起點；至戊戌變法止，是以制度領域的變革為收束。與時下多數專著相類，此書是由獨立發表的論文結集而成。這種成書方式的好處在於各章針對性較強，內容相對充實；弊端在於全書結構相對鬆散，或有重復或有矛盾。潘氏在相關主題上持續灌注了十數年的心血，此書從問題意識到內在理路都一脈相承。全書大致以文本為線索，各章主題之間多有呼應，敘述基本按時序編排，由此展示出史事之間時空上的勾聯，使得問題意識得以貫穿始終。

第一章「導論」介紹問題意識與學術史。第二章闡釋「知識倉庫」概念，並考察了中、西、日各方人士在「知識倉庫」建構過程中的作用。《海國圖志》、《瀛寰志略》、《萬國史記》等書進入「知識倉庫」，成為「共同知識文本」，在東亞知識圈裡流通、共用。閱讀是讀書人的身份標識，就個體而言，閱讀只能體現閱讀者的私人趣味，但讀書人群體的閱讀既為文教制度所規約，又受其所處的知識群體的影響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應時局與世風的變遷。潘光哲所用「世界知識」概念來自斯圖亞特·霍爾(Stuart Hal)，而「知識倉庫」概念則是來自舒茨(Alfred Schutz)，正是為了考察知識在公共空間的流通狀態。

「知識倉庫」概念本身看似直觀，但要加以清晰界定卻非易事。從內容上分析，潘光哲將研究範圍限定在「西學」周圍，而「倉庫」則是描述「知識」在傳播、積累、更替過程中所凝聚出的一種形態。「知識倉庫」概念實際上是假設了一個文本與讀者的公共空間，以此對文本傳播和閱讀行為的影響進行考察，其意義在於描述歷史進程的橫斷面，以關鍵時點的靜態剖析考察其動態過程。潘光哲大致重述了一個啟蒙敘事：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，本國處於「世界秩序」的核心，但這只是一個「神話」，當中國人開始追求「世界知識」（在潘氏的論述中，「西學」與「世界知識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互換，但又不可簡單等同），通過搜集、整理、閱讀「共同知識文本」建立起「知識倉庫」，「神話」即遭到解構，而新的「世界知識」得以確立。在此敘事中，「西學」處於尺規地位，西學知識與中國傳統學問天然異質，但輸入中國的「西學」並非天然構成系統（倉庫），其條理在外來觀念與本土傳統的互動中不斷重構而成。可以看出，潘光哲在理論方面頗有企圖，關於史學研究要不要講理論，該如何使用理論，近年來在中外學界都有廣泛的討論，這些反思不僅關係到史學研究如何展開的問題，而且涉及到史學在現代學術框架中的自我定位。潘光哲主張應當避免成見，理論框架可能帶來誤讀，但也不必因噎廢食。

第三章以朱一新為例作個案研究。朱一新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並不突出，但被時人引為對抗康氏邪說的理據，因此常常作為康有為的對手出現。潘光哲對朱一新本人的著述加以考察，以此展示傳統學人在知識轉型期的狀態。朱氏本身亦非守舊之徒，其所著《無邪堂答問》、《漢書管見》，內容相當多元，頗有以「西學」新知補舊學之缺者，他對學生的「西學」困惑有直接回應，從中新舊知識的汰換趨勢。

第四章以《時務報》為切入點，討論「西學」的「新聞化」。傳統著述多以名山事業自期，而新聞報刊則以時效性為看點，雖然晚清的「新聞」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，往往有數月乃至經年的遲滯，但較之以往的知識傳播途徑已然十分迅捷，正與時局形勢的快速變化相適應，故而得到社會各界的青睞。傳教士所主辦的報刊與其編譯的書籍一道成為輸入「西學」知識的管道，而國人自行開辦的報刊則從中國傳統的內部改變「知識秩序」，在讀書界引起多元迴響，甚至使得全國各地產生出「藉由閱讀報刊並交換知識情報形成的讀書社群」。（頁176）各類叢書、文集將載於報端的資訊、文稿收錄其中，新知以其稀缺性而處於獨佔地位，缺乏分辨力的讀者往往只能照單全收，這就使得大量的「一時資訊」被看做是「永恆不移的知識」。（頁207）

第五章以《沅湘通藝錄》為中心，考察科場作為體制力量對於「知識倉庫」的影響。梁啟超、唐才常等人在報端叱吒風雲，但真正決定讀書人命運的還是科場。回國後主持格致書院的王韜指出，「人於西學，一若無足輕重，以非畢生富貴功名之所繫也」。(頁244)科場上的權威屬於各地學政和考官，江標、徐仁鑄兩任湖南學政，將「西學」內容引入考題，改變了取士的標準。江標將考生答卷輯成《沅湘通藝錄》，編《西學通考》，徐仁鑄撰《輜軒今語》，向學子們指示了新的讀書門徑。江、徐等人所出的「西學」題目皆有來歷，其來源不外乎傳教士以及黃遵憲、薛福成、葛士濬等人編纂的新書，此外還有《萬國公報》、《時務報》等報刊，留意新知動態的考生大致可以看出答題的線索，學政們在有意無意間「成為調動『文化市場』方向的指揮」。(頁279)

第六章討論「讀書秩序」和「知識倉庫」的關係。在一個知識群體中，知識系統的價值序列大致存在明確而穩定的共識，其表現形式是書籍的等級和分類，「西學」地位的上升使得原有秩序受到衝擊，導致新「讀書秩序」的崛起。文本地位上升有幾類途徑，不外乎知識群體內部的認可與體制的外部認證，比如官員奏請重印，或是權威著作的引用，或是新學書目的推介，再或是科考題目的導向。「讀書秩序」的變更大多數時候關係到知識群體內「權威」的變化。讀書人面對這一變化，要想抓住新的上升管道，就必須適應新的「讀書秩序」，認準新權威並及時跟進，這導致在一段時期裡，知識的時效性意義被過分強調，而原本作為經驗、常識的知識則受到普遍質疑。

總而言之，知識的傳播和競爭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，「閱讀」對於社會各階層的意義也變得不同。潘光哲採用文獻追蹤和文本比勘的方式，發掘晚清士人閱讀活動中的多個面向，同時也展示了這一研究路徑究自身的豐富可能。潘光哲欲以「實證的析論」為史學研究建立更深入的基礎，超越既有的歷史敘事，進而「創生實質的歷史知識」(〈自序〉，頁2-3)，其工作是值得尊重的。

韋巍

中山大學歷史學系